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的提出和研究状况

一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的提出

在欧亚大陆的北区，从西北的斯堪的纳维亚到东北的西伯利亚的广袤地带，分布着诸多相近或相关的语言。这些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与联系。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有人开始注意这些语言之间的共同性。从此，它们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重视，并逐渐以“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课题形式提出来，展开长久的讨论。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共同性问题，甚至在真正讨论印欧语系假说和创立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之前，就已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方面。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连伯格（J. V. Strahlenberg）发表其《东北半球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一文，最早揭示了乌拉尔诸语和阿尔泰诸语语音结构上的共同性。一般认为，斯特拉连伯格文章的发表，是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的提出虽然早于印欧语言共同性的讨论，但是从真正比较语言学意义上对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却是在印欧语系假说的确立和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长足进展之后才展开的。自从琼斯（W. Jones）于1786年首次提出印欧诸语言同源的著名假设之后，经过一些

学者如博普 (F. Bopp)、拉斯克 (R. Rask)、格里木 (J. Grimm) 等人的研究, 使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确立和完善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 很快就给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到了 19 世纪中叶, 该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关问题的讨论不只是限于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共同性, 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词汇和形态成分的一致或相似问题。与此同时可能的语音对应关系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绍特 (W. Schott) 以词汇对应和形态关联作为观察基础, 探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一致关系。他发现楚瓦什语的 *r* 和 *l* 对应于其它突厥语言的 *z* 和 *š*。^① 他还曾讨论数词问题。^② 卡斯特连 (Castren) 则认识到单凭语言的粘着特征还不足以证明这些语言之间的同源性, 认为语言同源性的本质应该在于词素的一致性。他还试图论证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人称词尾的一致关系。^③ 绍特和卡斯特连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真正比较语言学意义上研究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先导。^④ 还应注意的是, 他们在研究和论著中首次使用“阿尔泰语言”这样的术语, 来泛指乌拉尔诸语言和阿尔泰诸语言。据说, 使用这个术语是根据阿尔泰山脉一带是欧洲东北部至西伯利亚地区的许多相近或相关语言的发祥地这样一个

① 绍特:《鞑靼语初探》, 柏林, 1836 年;《论阿尔泰或叫芬兰—鞑靼语系》, 柏林, 1849 年。

② 绍特:《楚地语组以及突厥语言、通古斯语言、蒙古语言中的数词》, 柏林, 1853 年;《阿尔泰研究, I-V》, 1859—1871 年。

③ 卡斯特连:《阿尔泰语言的人称附加成分》(博士论文), 赫尔辛基, 1850 年。

④ 一般认为, 绍特的《鞑靼语初探》(柏林, 1836 年) 是乌拉尔—阿尔泰诸语真正比较研究的先驱著作。

推测。^①

后来的比较研究越来越注意到语音对应关系的重要性，索瓦若奥（Sauvageot）曾指出，以往研究的缺点是把彼此相似、原因不明的一些词混在一起比较，他已经认识到词汇的相似或一般对应还无助于证实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于是主张建立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才有价值。^② 科林德尔（B. Collinder）也强调必须建立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然后才能从这些语音对应关系引出结论。^③

当时的比较研究，主要根据的是语言之间一般的类型特征。譬如，粘着的结构特征、相似的形态结构以及近似的语音现象等，并以此作为主要原则来划定以及判断语言的远近关系。而且，所涉足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作比较的语种繁多，也没有严格的界限。^④ 看来，这是受了早期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盛行的人类语言远缘关系理论思潮的影响。^⑤ 因而，在当时讨论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中，除芬兰语、萨莫耶德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之外，甚至企图把高加索诸语、德拉维达诸语、日本

^① 参阅谢尔巴克：《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许造福译，（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② 参阅鲍培：《阿尔泰语理论》，应琳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参阅鲍培：《阿尔泰语理论》，应琳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④ 参阅清格尔泰、刘照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⑤ 语言之间远缘关系的思想来源于语言起源的一元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类语言是从一种原始共同的母语演化发展而来。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使语言从理论上跨地域建立起了谱系关系。语言远缘关系的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语言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语、朝鲜语、后来还把凯特语、叶尼塞流域的科特语、阿林语、阿桑语也纳入比较和讨论的范围之内。

到19世纪下半叶，温克勒（H. Wenkler）、班·维廉（W. Bang-kaup）等学者继续进行有关这些语言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使用“乌拉尔—阿尔泰”这样的术语。^①到19世纪末，经过相当长时期调查研究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亲缘关系的假说逐渐形成。

二 对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重新划分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这些语言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类型的一些相似现象。其中，被认为最主要的有语音结构上的元音和谐和语法结构上的粘着特征。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这类共同特征虽然强烈地暗示着这些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亲缘关系，但是如果仅仅用这些共同特征来证明语言亲缘关系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结构类型上的相似不仅在亲属语言之间存在，在非亲属语言之间也同样可以存在。^②这实际上指出了判定语源关系不能只凭结构类型标准。

自从绍特和卡斯特连的研究论著问世之后，语言学家们的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转向。当时，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共同性问题虽然作为一种语系假说被提出讨论，并一时得到一些学者的支

在当时的一些论著中，常把“乌拉尔—阿尔泰”和“阿尔泰”当作等同的概念。例如：温克勒：《乌拉尔阿尔泰民族和语言》（柏林，1884）；《阿尔泰民族和语言的范围》（莱比锡，1921年）；班·维廉：《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研究》（莱比锡，1890年），《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及其对印度日耳曼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比利时论文集》，1893年）等。

^② 参见清格尔泰、刘照雄：《阿尔泰语文学概述》，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持，但后来的研究却逐渐趋于注意乌拉尔诸语或阿尔泰诸语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则有所淡化。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看到乌拉尔诸语和阿尔泰诸语之间相远的一面。到 20 世纪初，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或怀疑。^①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语言（即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不应划入一个语系。于是，主张探索亲缘关系的学者将原来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划分为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经过重新划分之后，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而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有的学者把朝鲜语也比较肯定地划入阿尔泰语系。^② 此外，日语和阿尔泰语系的关系问题也曾被一些学者提出来讨论。^③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重新划分，对原来的语系含义是一种变革，也是语言关系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从学术发展上看，这种划分和调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这些语言共性与联系的实际远近程度，较客观地划定了语言关系的界限。第二，促使人们探讨符合于研究各语系语言发展规律的新的理论方法。像兰司铁（G. J. Ramstedt）、科特维奇（W. Kotwicz）、鲍培（N. Poppe）等学者的研究，正是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需要探讨新的理论方法的反映。第三，通过对原来讨论的语系的重新划分，新的语系所涵盖的范围缩小，这样

^① 当初兰司铁就曾怀疑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把他的研究局限于阿尔泰诸语言，即突厥语、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等。鲍培的研究范围也如此。

^② 主张将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的代表性学者有波里万诺夫、兰司铁、李基文等人。

兰司铁、缪勒、服部四郎、村山七郎、清濑义三郎则府等学者曾不同程度地探讨过日语和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问题。

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深化和精密化。

三 新的阿尔泰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把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分开以后，在新的阿尔泰语言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学者们在多种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以各自的理论方法继续讨论各族之间的语源关系，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意见，充实了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的内容。下面将分几个部分来简述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一）有关同构与对应的讨论

众所周知，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似的一些特征。在语音方面，各族之间具有相类似的语音结构和变化规则。在词汇方面，有大量的语音对应、意义相同或相通的关系词。在词法方面，构词和构形变化中普遍采用粘着手段，很多形态成分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与联系。在句法方面，有较为一致的句法形式，句型结构普遍呈 SOV 型，有后置词而无前置词，句子和词组中限定成分位于被限定成分之前，等等。学者们虽然都承认这些语言之间存在上述相似特征，但对其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却有不同的认识或解释。归结起来，问题的焦点在于这些相似特征是同一母语原始结构或成分的延续，还是早期历史接触和相互影响的产物。认识上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学者致力于挖掘和研究语法同构与语音对应的实际材料，在此基础上阐明阿尔泰诸语言有亲缘关系的结论。他们以发生学的谱系树模式构建其理论学说，并试图构拟原始共同语。另一派学者则将同构与对应归结为类型学问题，进而认为类型特征的一致性不一定是由于共同的起源，而是由于彼此之间的频繁的历史接触和相互影响造成的。他们还致力于探索共同类型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揭示语言影响在年代上的不同层次，并试图区分固有成分和借贷成分。

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西方学者把它用到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上已取得初步成果。一般认为，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是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兰司铁的主要业绩在于，长期实地调查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挖掘阿尔泰诸语言大量的关系词，并试图证明这些词的同源关系。^① 提出许多共同的形态成分，阐述形态变化的一致性，构建了阿尔泰诸语言比较形态学的理论框架。^② 建立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③ 自从绍特发现楚瓦什语的 r 和 l 对应于其它突厥语的 z 和 ξ 以后，兰司铁又把这一对应扩展到蒙古语中。他第一次注意到蒙古语的 r 与突厥语的 z 、蒙古语的 l 与突厥语的 ξ 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认为蒙古语和楚瓦什语的 r 和 l 比突厥语的 z 和 ξ 年代上更早，也就是说 z 和 ξ 分别来源于早期的 r 和 l 。鲍培（N. Poppe）、普里查克（O. Pritsak）、铁肯（T. Tekin）等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对应规律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被称之为阿尔泰理论的柱石。^④

此外，兰司铁确立的阿尔泰诸语言的辅音对应规律主要有：蒙古语词首辅音 n -、 d -、 j -、 y - 分别对应于楚瓦什语的 ξ 和其它突厥语的 $*y$ ；突厥语词间的 $-p/-b$ - 对应于蒙古书面语词间的 $-y-$ ；根据三个语族语音材料判明的突厥语词首的 \emptyset -（零形式）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h - 对应于满语的 f - 对应于赫哲语（那乃语）的 p - 对

兰司铁：《卡尔梅克语辞典》一书，可称得上是阿尔泰诸语言历史比较词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部辞书的材料，是著者从各种阿尔泰语言中收集的，其中包括兰司铁所挖掘的大量的关系词材料。该辞书于 1935 年在赫尔辛基出版。

^② 参阅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赫尔辛基，1952 年。陈伟、沈成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 参阅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语音学），赫尔辛基，1957 年。该著作奠定了阿尔泰诸语言比较语音学的基础。

^④ 有关这一对应规律的详细讨论参见铁肯：《Z 音化与 S 音化：阿尔泰理论的柱石》，宋正纯译，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4，北京，1991 年。

应于埃文基语和拉穆特语的 h 等。该对应规律经伯希和 (P. Pelliot) 的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之后, 被称为“兰司铁—伯希和定律”。^①

兰司铁的研究为后来阿尔泰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之后, 不少学者也致力于研究阿尔泰语言学问题, 并在某些领域中取得瞩目的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符拉基米尔佐夫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冈伯茨 (Z. Gombocz)、鲍培、孟格斯 (K. Menges)、巴斯卡科夫 (N. A. Baskakov) 等学者的研究。^② 其中尤其是鲍培以他的研究成果维护和发展了阿尔泰语系语言同源论的理论观点。他在许多专题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把探索同源词和建立语音对应及音变规律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③

然而, 主张亲缘论的学者竭力研究和论证同源关系的同时, 阿尔泰语系假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兰司铁属于同一时期的波兰著名学者科特维奇 (W. Kotwicz) 详细考察了阿尔泰诸语言语音、语法、词汇的关系之后, 认为这些语言的共同性反映的是类型的一致, 而类型的一致主要是由于早期相互接触及相互影响

① 关于这一语音对应规律, 一些学者如索瓦若奥、塞诺尔 (D. Sinor)、韩伯诗 (L. Hambis)、桑席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史禄国 (S. M. Shirokogoroff)、琴齐乌斯 (В. Н. Цинциус)、谢尔巴克 (А. М. Щербак) 等人曾从不同角度讨论过。有关讨论的评述详见谢尔巴克《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一文, 许浩福译, 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 1982年。

② 这些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有: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 1929年, 陈伟、陈鹏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冈伯茨:《论阿尔泰语言的语音史》载《东方评论》13(1912)1—37页, 布达佩斯。鲍培:《阿尔泰语比较语法》, 第一部《语音学》, 威斯巴登, 1960年;《阿尔泰语言学引论》威斯巴登, 1965年。孟格斯:《突厥人和突厥语言——突厥学导论》, 威斯巴登, 1968年。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 莫斯科, 1981年。

③ 参阅鲍培:《阿尔泰语比较语法》, 第一部《语音学》, 周建奇译, 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所1983年;《阿尔泰语言学引论》、周建奇译, 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所1984年;以及其它多篇专题论文。

造成。^① 格伦伯格 (K. Grønbeck)、李盖提 (L. Ligeti) 等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的意见更为尖锐, 他们认为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所有相同或相似成分都是由接触及借贷关系导致的, 而不是同源关系的表现。像克劳森 (G. Clauson)、道弗尔 (G. Doerfer)、本青 (J. Benzing) 谢尔巴克 (A. M. Sherbak)、洛纳塔什 (A. Rona - tas) 等学者均主张这样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 对亲缘论者所得出的被认为是重要的语音对应规律已提出质疑。譬如, 对突厥语的 *z* 和 *s* 对应于蒙古语的 *r* 和 *l* 的问题, 像克劳森、道弗尔等学者虽然也承认这一语音对应关系的存在, 但把有这种对应的关系词看成是借词。并将借贷的方向确认为由突厥语借入蒙古语。谢列勃连尼科夫 (B. A. Serebrennikov) 等学者也认为: 如果蒙古语真的在起源上与突厥语有亲缘关系的话, 那么 *r* 音化和 *l* 音化也应当在蒙古语起源的词中表现出来。然而专门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 却没有获得肯定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与突厥语词形相对应的蒙古语词形 *z*: *r* 或 *š*: *l*, 在楚瓦什语中有同样的反映。因此得出结论, 带有 *r* 音化和 *l* 音化特征的词是从楚瓦什语型的突厥语传播到了蒙古语中。^② 洛纳塔什在其专门探讨辨别借词的方法论据的文章中, 基本上否定了用 *z*: *r* 和 *š*: *l* 的对应规律来论证突厥语和蒙古语同源的可行性。^③

关于“兰司铁一伯希和定律”, 本青的研究认为 *p - f - h - 0*

① 参阅科特维奇:《阿尔泰语言研究》, 克拉科夫, 1953年, 俄译本, 莫斯科, 1962年。有关该著作的评述参见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言研究)俄译本绪言》, 良益译, 载《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1, 北京, 1977年

谢列勃连尼科夫、哈尔科娃:《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问题的一些有效方法》, 许浩福译, 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7, 北京, 1986年

洛纳塔什:《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 ——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 陈鹏译, 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 北京, 1982年。

(零形式)演变的规律并不能说明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语言共同起源的问题。^① 谢尔巴克在分析关于 p-f-h-0(零形式)演变的实际材料以及检验多项研究成果之后,指出“兰司铁—伯希和定律”虽然是根据三个语族语言材料判明的惟一语音定律,但这一定律不是论证阿尔泰诸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的主要规律。^②

形态学方面,谢尔巴克曾验证兰司铁所重拟的阿尔泰诸语言形态的一些形式之后,否定了兰司铁所构拟的一些形态成分在起源上有同源关系。同时,他解释为阿尔泰诸语言中形态成分的一致或相似是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及借贷引起的。他还举例指出兰司铁曾确认的大量词汇的和形态的平行关系并没有充分的根据。^③

在词汇方面,克劳森、道弗尔、洛纳塔什等学者验证了阿尔泰诸语言的大量的关系词之后,认为产生这些关系词的原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接触以及由此制导的语言成分的影响及借贷。他们还试图划分出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历史接触的年代层次。^④ 还曾探讨如何确认不同语言中的借词的方法和论据等问题。^⑤

参阅本青:《阿尔泰语文学》,刘照雄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北京,1981年。

参阅谢尔巴克:《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许浩福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参阅上述谢尔巴克文章。

^① 就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历史性接触的年代层次问题,克劳森曾经作过专门的论述,其主要内容可参阅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周建奇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1983年。

^② 就确认借词方面,克劳森提出的一些方法参阅谢尔巴克:《克劳森关于阿尔泰语学的著作》,胡增益译,载《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1、北京,1977年;洛纳塔什的有关辨别借词的方法和论据的探讨详见其《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陈鹏译,《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这样，在阿尔泰诸语言的同构与对应问题上，可以说有来自“亲缘论”和“接触论”两个方面的讨论。讨论它们有亲缘关系的一方，热衷于寻找语言之间结构的同构和词汇的语音对应，并以此作为证据，试图论证这些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认为它们只有接触关系的一方，则从早期历史接触及影响的视角，对语言结构类型的共性与语言成分的一致性作出各自的解释，并由此得出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接触关系的结论。

（二）对语源关系的种种认识

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同构与对应现象已经成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但是，以往的研究对这些语言的同构与对应所作出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如前所述，它既可解释为同源关系，也可解释成接触关系。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解释，便导致了语源关系认识上的分歧。

关于阿尔泰诸语言的语源关系，根据学者们的看法，大致归纳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即亲缘论者主张的谱系关系和接触论者主张的接触关系。

关于阿尔泰诸语言的谱系关系，起初兰司铁的看法不甚明确。^①而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由共同阿尔泰语首先分离出共同蒙古—突厥语和共同通古斯语。然后，前者又分离为共同蒙古语和共同突厥语。^②符氏的见解可能和兰司铁的原意相符。鲍培的谱系分类则有所不同，他认为：共同阿尔泰语统一体先分离为楚

最初，兰司铁对于产生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原始共同语是否存在表示怀疑。但1916年他就提到共同蒙古—突厥语（即“蒙古—突厥原始语”）。很难看出兰司铁所提出的蒙古—突厥语统一体是阿尔泰语言统一体分解以后的阶段，还是以为蒙古—突厥语已经等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兰司铁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清楚的回答。参阅鲍培：《阿尔泰语理论》，应琳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年。

^②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图式见其《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陈伟、陈鹏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瓦什—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语统一体和原始朝鲜语。然后，前者又分离为楚瓦什—突厥语统一体和蒙古—满洲—通古斯语统一体。这两个统一体又继续分离，前者分离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后者则分离为共同蒙古语和共同满洲—通古斯语。以上语言分别又继续分化为楚瓦什语、突厥诸语、蒙古诸语、满洲—通古斯诸语。^① 巴斯卡科夫的分类基本上接受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见解。但巴氏提出的发展图示则是从更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概念出发的。他认为：欧亚北方部落的方言土语合并构成了若干共同体的语区，其中的一个就是乌拉尔—阿尔泰语共同体（乌阿 a、b、c、d…）。后来，由于氏族和部落的增加而分离为乌拉尔语共同体（乌 a、b、c、d…）和阿尔泰语共同体（阿 a、b、c、d…）以及其它一些共同体；阿尔泰语共同体本身，又再分解为突厥蒙古语共同体（突蒙 a、b、c、d…）和通古斯满洲语共同体（通满 a、b、c、d…）以及其它一些共同体；突厥蒙古语共同体再分解为突厥语共同体（突 a、b、c、d…）和蒙古语共同体（蒙 a、b、c、d…）。^② 值得注意的是，巴氏的发展图示中考虑了阿尔泰诸语言与相邻语言的接触以及底层影响等因素。他曾强调阿尔泰语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分化为主的趋势中，分与合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过程。他对突厥语的分类中也贯穿着这一思想。

与上述谱系分类不同的是一些学者提出的语言接触关系的见解。他们对阿尔泰诸语言在历史上的接触关系提出了各自的设想。科特维奇认为：在很远的时代，纪元前若干世纪以前，在汉

^① 参阅鲍培：《阿尔泰语言学引论》，周建奇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84 年。

^② 参阅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周建奇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83 年。

族以北居住着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洲的一些部落，他们所操各不相同但结构类似的语言。在迁徙过程中，这些部落的个别集团分化出来，孤立起来。而其语言在新底层的影响下，逐渐获得自己的特点。比如，原始布加尔人和现代楚瓦什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在芬兰语底层影响下有了独有的特点；或者现代雅库特人的祖先，由于受到蒙古人和通古斯—满洲人相当大的影响，其语言中也出现了独有的特点。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蒙古和通古斯—满洲的一些部落中。然而，科特维奇认为这样的假设也是可能的，即阿尔泰三个语族在极古时代可能有统一的基础语，这样的基础语后来由于不同底层的影响而分化，形成三个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洲语族。^①

克劳森则明确指出阿尔泰诸语言的语源关系为接触关系，并认为这种接触关系以突厥人和蒙古人 4—7 世纪在中国，8—12 世纪在贝加尔地区，以及 13—14 世纪在突厥斯坦的密切接触来加以解释；共同的突厥语和满通古斯语成分，被说成是在 7—10 世纪渤海国存在时期突厥人和通古斯人往来的结果。而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的共同成分则是 10—12 世纪契丹人所建立辽帝国的存在和 17—18 世纪满族借用蒙古文字时代的产物。^②

塞诺尔（D. Sinor）则从更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范围內讨论它们之间的接触关系。他将这些语言之间的接触分为南北两个径路。认为南方径路是由萨莫耶德语、芬—乌戈尔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的途径进行接触的；北方径路则由芬—乌戈尔语、萨莫耶德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的途径进行接

参阅科特维奇：《阿尔泰语言研究》，克拉科夫，1953年；俄译本，莫斯科，1962年。又参见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言研究》俄译本绪言，良益译，载《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1，北京，1977年。

^② 转引自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周建奇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1983年，第42页。

触的。^①

塞诺尔提出的径路说，很值得注意和仔细琢磨。从他的径路说可以看到，突厥语和芬—乌戈尔语、蒙古语；蒙古语和突厥语、通古斯语；通古斯语和蒙古语、萨莫耶德语；萨莫耶德语和通古斯语、芬—乌戈尔语分别在早期有过特殊的接触。可见，仅就阿尔泰诸语言来说，其接触是通过突厥语和蒙古语、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这样的径路来进行的。并且这些语言之间的接触是整个乌拉尔—阿尔泰语言接触径路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塞诺尔认为，就形态学而言，蒙古语跟南支通古斯语之间的相似性比前者跟北支通古斯语之间的相似性要大；而突厥语跟芬—乌戈尔语之间的关系要比前者与蒙古语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②

以上我们扼要地介绍了最主要的几种关于阿尔泰诸语言语源关系和语言发展过程的认识或设想。这些认识或设想，主要根据关于语源关系和语言发展的不同理论模式（如谱系树模式或接触及联盟模式），在不同的层次（如阿尔泰语言或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上，对这些语言的语源关系以及历史发展问题试图作出各自的解释或估计。这些尝试对于阿尔泰语言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探索。

（三）以往研究的主要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① Denis Sinor “The Present State of Uralic and Altaic Comparative Studies”,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Korean Liberation, Aug. 11—20, 1975（汉城）。这里参考了清濑义三郎则府：《日本语学和阿尔泰语学》（日文版）明治书院 1991年版，第 255 页；洛纳塔什：《突厥学导论》，塞格德，1991 年；李增祥的评介和节译载《突厥语研究通讯》，1995 年 1—2 期，北京。

^② 参阅清濑义三郎则府：《日本语学和阿尔泰语学》（日文版），明治书院 1991 年版，第 255 页。

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研究者们出版的有关各种问题的著作据说不下千余种。^① 以往的研究无论是在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有关重要语言现象的探讨上，都取得了注目的成绩。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中比较重要的有：在比较语音学方面，构拟了阿尔泰原始语的语音结构，描述了阿尔泰原始语的元音和辅音音位及系统，并对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比如对长元音、元音和谐现象和辅音和谐现象等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语音对应规律和语音演变规律，其中有“兰司铁—伯希和定律”；突厥语 *z*、*ʃ* 对应于蒙古语 *r*、*l* 的规律；突厥语和蒙古语词首辅音对应规律；突厥语与蒙古语、满通古斯语词间、词末辅音对应规律；原始突厥语和蒙古语非词首辅音颤音（*r*）化和边音（*l*）化问题等等。在比较形态学方面，对构词法和构形法系统，某些词形变化范畴做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比较词汇学方面，关系词的挖掘取得较大的进展；与此同时，辨别和确认借词方面也得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论据。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假说，较重要的如阿尔泰语言词根和词缀构造假说；动词变位形式起源于形动词的假说；依据词末元音特点判断突厥语和蒙古语词根产生先后的假说等等。^② 另外，学者们就语源关系和语言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或设想。可以说，经几代学者的不懈的努力，通过长期而艰难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已逐渐形成。

尽管以往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在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某种

此说据谢尔巴克：《克劳森关于阿尔泰语学的著作》，胡增益译，载《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1，北京，1977年。

见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程度的进展，但是对与语言历史发展有关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还没有作很深刻的探讨，尤其是各语族之间的语源关系还不能说已经弄清楚。综观以往的研究，尚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 从既定的理论学说出发研究和解释语言关系和语言发展问题。前提理论的不同又导致了研究角度及方法的不同，进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亲缘论者所主张的同源关系是在谱系树模式类比下提出的。这类研究依据的是同构与对应两个标准，以此来论证语言的同源性。然而，自从特鲁别茨柯依（N. Troubetskoy）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提出用同构和对应解释语言之间谱系树或同源关系的不充分性^①以来，研究结果越来越表明同构与对应不能成为判明同源关系的决定性标准。这是因为，除了同出一源的语言之外，密切接触的语言之间也能够形成同构和对应现象。^②因此，还不能因为阿尔泰诸语言在结构上的同构和语音上的对应就判定其语源关系为同源关系。正因为这样，反阿尔泰语系亲缘论的学者却以语言之间的接触及影响来解释同构与对应现象以及它们的产生原因。而这一类学者的主张实际上又依据的是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的理论学说。他们的研究，虽然尽力揭示语言接触的方式和接触的年代层次以及试图探讨辨别借词的方法论，但是还没有详细考察和深入探索接触及影响的历史过程和由它制约的语言历史发展的主要模式和主要机制。以上两种关于语言关系和语言发展的观念，是否符合阿尔泰诸语言的实际情况，还有待于研究证实。

2. 阿尔泰诸语言缺乏古代语言材料，这方面远不及印欧语

^① 参阅特鲁别茨柯依：《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1937年。雷明译，《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4期。

^② 参阅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洞台）语言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系甚至汉藏语系语言。目前所知关于这些语言最早的材料有：突厥语族有属于 7—9 世纪的古突厥鲁尼文碑铭。蒙古语族有 13 世纪初用回鹘体蒙古文刻记的《成吉思汗碑石》（也称《也松格碑石》）以及 14 世纪（明代）用汉字音译写成的《元朝秘史》（也称《蒙古秘史》）。在此之前，还有一些始于 10 世纪的契丹文材料，一般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满通古斯语族有，属于 12 世纪的女真文材料以及 14 世纪明代四夷馆编的《女真译语》等。这些语言材料无论是年代上，还是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比较研究的需要。这也是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步履迟缓，且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以往的比较研究主要利用的是各语族的近现代语言材料。然而，阿尔泰各语族的形成曾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分合发展过程。因此，只利用现代语言材料还很难说清楚现代各语族形成之前的那一很长历史阶段的语言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机制。

3. 没有充分利用操阿尔泰语言的古代民族的人文历史材料。要想彻底解决涉及语言关系和语言历史发展的问题，当然首先要对语言本身去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语言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从这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又和操这些语言的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连的。这说明在语言史研究中除语言材料本身，还可以辅助利用有关人文历史材料。然而，以往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没能充分利用或可以说几乎忽视了操阿尔泰诸语言古代民族的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材料或者从相关的视角考察和试探语言的历史发展问题。就严重缺乏古代语言材料的阿尔泰诸语言来说，考察其早期语言发展状况时，相关的人文历史材料尤为重要。今后的研究，应积极借鉴和吸收有关古代北方民族的人文历史研究成果（如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将其利用于语言史和语言发展的研究中。

总之，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情